

国宗等挈仪器往测晷度，注之宪书，以示同文），条风翘首向东看。¹

此诗作于乾隆二十二年春，是时准部初定，地名亦列入时宪书，而此举显然也被高宗自视为是“同文之治”的象征。在乾隆三十七年冬所作的一首诗中，高宗再次提及了这种盛世图景，称“万方大一统，三代久同风；东颡西鹑合，考文制度融”。并为自注云“自世祖章皇帝顺治甲申至今年乾隆壬辰，计一百二十九年。其奉正朔者则自朝鲜诸属国及藩部四十九旗外，并及准部、回城，远至爱乌罕诸部，悉为考定节气，详列书中”²。外藩与属国咸奉正朔，本身就是清朝“一统无外”的明征，而君主“考文”、“制度”，将归附之地渐次列入时宪书，固然是高宗自拟于德位兼备的圣王，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风俗各异的族群，都在清朝的统治框架下相协调共存。

质言之，同文与大一统犹一事之两面，同文必以大一统为前提，而大一统亦端赖同文之维持。理解清代的同文之治，一方面需要兼顾治统与道统的双重层面，这是高宗君臣论述逻辑精义之所在；另一方面，亦需要将同文置于大一统的前提下思考。清帝协调非汉族群的实效或虔敬尊儒的成绩，正是两者交相为用的结果，未可厚此薄彼。清代皇权也因此方能跨越语言与族群的界域，而具有超轶前代的治理效力。唯有回到清人的语境中，方有可能对清代国家政治构造的特色与性质有差近事实的理解，庶不致有“对塔说相轮”之讥。

【论 文】

从“天下”到“国家”： 清末语言运动中的“声音”和言语文化³

黄 华⁴

卢懋章在1892年刊行《一目了然初阶》，正式拉开了清末切音字运动的序幕。从1892年到1910年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共有27种切音字方案问世，绝大部分是在1895年之后产生（王东杰，2010）。切音字，是一种拼音文字，又叫“快字”、“简字”、“拼音字”等。在1900年以前，切音字主要是以方音为标准，这一阶段强调的是“言文一致”。到了1900年以后，官话方案开始大量出现，连福建人卢懋章也不甘人后，在1906年提出“颁定京音官话，以统一天下之语言也”，在清末最后十年里“统一语言”、“国语”的呼声愈来愈高。无论是“言文一致”，还是“统一语言”，都在强调“声音”的重要性。

在汉字·汉语系统中，“声音”受汉字“归化”，是一种隐匿的存在方式，两者并未截然分开来，而是形成一个模糊的整体。在汉字·汉语系统中，“语”、“言”、“言语”、“语言”都和“文字”不可离析。西方人以说话发声为本质而排斥文字书写的那个整体性“语言”概念，在中国语言传统中并无对应的名称。最重要的是在“语”、“言”和“文”、“字”这些概念之上，并不存在一个更大更高的清晰的概念来涵摄一切（郅元宝，2010）。在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999: 47-48）看来，“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他的意图是为了把语言（声音）从文字的僭越中拯救出来。在谈到汉语时，他指出（1999: 51）：“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

¹ 《御制诗二集》卷60《丙子春帖子》，《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集》第3册，第379页。

² 《御制诗四集》卷8《生冬二十首仍用元微之生春诗韵》，《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集》第6册，第352页。

³ 本文发表在《传播与社会学刊》总第29期（2014年），第207-233页。

⁴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从事媒介史方面的研究。



语言。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他们有时就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但是这种代替因为可能是绝对的，所以不致像在我们的文字里那样引起令人烦恼的后果。汉语各种方言表示同一观念的词都可以用相同的书写符号”。简而言之，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并不适用于汉字系统。

西方的表音体系则不同，在柏拉图那里就已经明确了“声音”对“文字”的优势地位，“讨论中的逻各斯”的等级高于“写成文字的逻各斯”。声音的“形式主义的纯粹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摆脱类似于文字的形体化的干扰，更能代表真理的“在场”。而文字则是声音的替补、派生物，是符号的符号，它的存在“威胁着呼吸、精神，威胁著作作为精神的自我关联的历史”（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1999: 34）。对“真理”的孜孜以求，是西方思想的动力性因素，为了抵达观念的位所，而忽视了介质的存在，割裂了能指和所指。因此在许多西方哲人看来，如洪堡就认为非拼音文字“不能完美地执行语言的解析功能”，黑格尔就认为象形文字是“聋子的阅读和哑巴的书写”。所以，西方思维注重的是切割和分析，而中国则偏向于调和与移情（弗兰索瓦·余莲 Francois Jullien, 2009）。

到了清末，人们突然发现，声音语和文字语竟然有如此可怕的分离，中国广大区域“各操土语”，互不沟通，身处异地如在“异国”。在此前上千年的历史中，“土语”各异并不妨碍王朝体系内部的沟通，因为仅仅凭借汉字、文言系统就可整合起帝国体系（赵鼎新，2006）。虽然也有南方一些官员因不通官话造成沟通上的困难，但朝廷上下以汉文为媒介即可传递信息，方言问题就被忽视了¹。所以，在清末最后十来年时间，“声音”为何会作为“汉字”的对立面被单独强调，为儒家文化的传布和绵延提供物质基础条件的汉字·汉文在清末为何开始失效，为何会形成一股以讲报、戏曲、音乐、演说、白话等形式展示的“声音”的文化（统称为“言语文化”），以及“声音中心主义”如何与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交织在一起。这是本文需要探讨的问题。

从“天下”到“国家”：“声音”的释放

作为“宇宙之冠冕”的汉字·汉文，它的神圣性和“天下”观念是交融在一起的。那何为“天下”？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2000: 84）指出：“‘天下’的含义是‘（中国的）帝国’，换言之，亦即‘世界’。所以‘天下’意味着中国即世界。”“天下观”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至上主义”的观念，以儒家文化为宗，在文化主张上是排他的，但在文化边界的设定上是包容的，以夏变夷，显示文化的“威仪”（金观涛、刘青峰，2009）。所以，“天下观”强调的是同一性而非差异，同化而非接纳异质文化。而若要长期维持中心和边缘的文化关系，就需要控制文化内部的各个要素之间的流动，以及严格警惕和拒斥来自异文化的“侵袭”。若把“天下”看成是一个系统，外部信息被禁止流入，意味着系统中由信息的缺失所引起的熵的增加，可由系统内部各要素自由度的丧失予以消除（陈卫星，2008），但长此以往导致的是自我更新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

汉字·汉文作为同一文化圈内被唯一认可的书写媒介，在其中扮演“基础性硬件”的功能作用，承担文化在时间上的接续和信息在空间上有限传布的职责。它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于王朝国家之中，也正是因为符合了封闭、自足的系统内部信息流动速率和边界限定的要求。梁启超（1958: 8）早年就提到：“中国文字能达于上，不能逮于下”。识习汉字·汉文耗费的漫长光阴为一般民众进入士阶层设定了较高的文化门坎，维护了精英阶层的“知识垄断”。再者，少数人经过多

¹ 雍正可能是真正提出语言问题的唯一清朝皇帝，他曾下令从南方省份福建、广东来的官员，要学习官话。事实上，这些省份的方言与官话毫无相似之处，因此官员们很难掌握官话。1728年，雍正皇帝下谕旨，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为确保正音（即官话），聘用能讲标准官话的教官，在各省从教。但到了1737年这一制度就被废止了，见马西尼，1997，《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第4页。

年科考到达庙堂之上，又控制了社会流动的规模。因而，信息以书面、文言文形式在士阶层内部的流通，“文人与众人如两世界”（王照，1958：19），将士农工商各个阶层限定在各自的活动区域，相互隔绝，从而维持“天下”体系的正常运行。

汉字·汉文是偏向时间的媒介，以衍形为主，自身形体的固定化使之难以“与时俱进”，却能较好地保存旧有的文化形态。梁启超（1994：78）在《新民说》中对衍形文字的“弊端”做了论述：

故衍声之国，言文常可以相合；衍形之国，言文必日以相离。社会之变迁日繁，其新现象、新名词必日出，或从积累而得，或从变换而来，故数千年前一乡一国之文字，必不能举数千年后万流汇沓、群族纷拏时代之名物意境而尽载之尽描之，此无何如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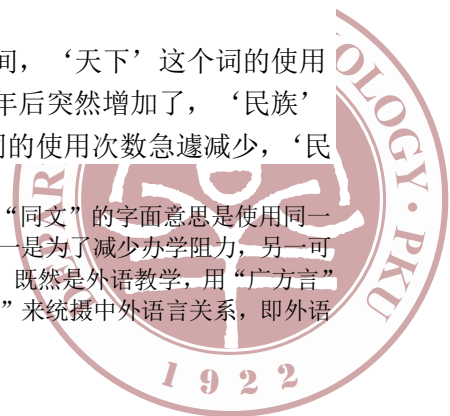
可以做此设想：倘若字随音变，在中国辽阔的区域内方言驳杂，如何以“音”来统合“天下”。“音”因时因地之变，又如何能保证“天下”的长久恒定。在这个意义上，汉字·汉文的时间偏向和“天下”讲求超稳定性的特质是相符的。“一种媒介经过长期使用之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它传播的知识特征。也许可以说，它无孔不入的影响创造出来的文明，最终难以保存其活力和灵活性”（哈罗德·英尼斯 Harold A. Innis, 2003：28）。媒介锻造了人们的时空感知，反过来又强化了这一文明的“惰性”。在由媒介搭建的“镜像”中，人们如那喀索斯般迷恋镜面反射出的“倒影”，自恋式麻木使之认定媒介是自然的存在（麦克卢汉 McLuhan, 2000：359）。所以在长时间里，汉字·汉文作为“日用而不知之物”，人们丝毫不会去质疑它存在的合理性。更何况，汉字·汉文自身还是人们膜拜的“圣物”。

所以，虽然方言各异是显见的事实，但“声音”的存在一直被“压抑”。原因有三：其一，人们进行自我催眠，将汉字·汉文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这种“自恋式麻木”的状态妨碍了对其它媒介的认知。其二，“声音”是多样的，是一种流动性强、意义模糊多变、无法进行垄断的传播方式，蕴藏着叛逆颠覆的危险（吴予敏，2001；李庆林，2006）。“声音”的多样性、异质性乃至是潜在的危险，被汉字·汉文“收编”和整合，以维持“天下”体系的秩序。其三，“声音”按照杜威的解释，是一种听觉文化，意味着“参与”（詹姆斯·凯瑞 James W. Carey, 2005）。但在“天下”体系内部，冷静的“旁观”代替了热情的“参与”，这样才能抑制系统内部各要素的活跃程度。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天下观”受到来自泰西的“国家观”的竞争，不断趋于下风。在这个过程中，条约体系的建立，汉字·汉文的地位在逐渐陷落。但清政府还要维持表面的荣耀，将外语学校定名为“同文”或者“广方言馆”¹。这种命名方式，一方面体现了清政府的“虚骄”，另一方面则是人们还依然以“天下观”的姿态来辨别对外关系（陈旭麓，1992；熊月之，2011）。封闭的“天下”体系，无法拒斥来自外来系统的武力侵略，自身又丧失更新能力，只能“自欺欺人”地在想象的自足中保持最后的“体面”。尤其在甲午之后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处于加速度转变的状态。“快”的体验和急迫促逼着志士们寻找现实困境的出路。在内外交困的情境之下，中国的“天下”不得不向“国家”“屈服”，如列文森（2000）认为的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转变。

金观涛、刘青峰（2009：242）指出：“在1895至1899这四年间，‘天下’这个词的使用达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峰，而‘国家’一词的使用，也是在1895年后突然增加了，‘民族’一词的使用则到1900年后才开始井喷之势。1900年以后‘天下’一词的使用次数急遽减少，‘民

¹ 自鸦片战争以来，凡涉及到语言问题，“同文”一词出现的频率就相对较高，“同文”的字面意思是使用同一种文字，实际上中英法俄的文字差异甚大，用“同文”一词来命名语言学校，一是为了减少办学阻力，另一可能就是陈旭麓先生所提到的“虚骄”。“方言”一词明显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既然是外语教学，用“广方言”名之，就并不承认外语和汉语是处于同等地位的语言，这里似乎又以“天下观”来统摄中外语言关系，即外语是作为汉语的“方言”而存在。



族’一词急遽增加，这在19世纪是难以想象的。”“国家”、“民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频次之高，可以反映出它们已经作为一种新的概念工具和思想资源进入志士们的思考视野。而切音字运动呈上升状态，也是在1895年之后。

从“天下”到“国家”的转变过程中，传播情境发生了三重变化：一是对“民众”的发现。王照（1958：20）称：“余今奉告当道者，富强治理，在各精其业、各扩其职、各知其分之齐氓，不在少数之英隽也。”梁启超（1994：1-2）则言：“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则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伴随着对民众的发现，就开始了将原先是“天下”的臣民、部民改造成“国民”、“新民”的启蒙运动。“1900年代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走向人民’运动，在本质上是一次思想、文化和社会的改良运动，具有强烈的启蒙意义”（李孝悌，2001：247）。

二是晚清志士们不得不接受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这一既成事实，开始从政治利害关系而非文化道德的角度去审视国家间的关系。早先的优越心理和现实情境的反差，又迫使他们急切寻找一种能够快速治愈病痛的“快”媒介。推行切音字运动的一个“强势”理由，即能迅速改变落后状态。卢懋章1892年出版的《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其书名就有一个“快”字；蔡锡勇的《传音快字》，也有“快”字。劳乃宣（1957：347）：“此字传习极易，至多不过数月而成。以一人授五十人，计之一传；而五十人再传而二千五百人；三传而十二万五千人；四传而六百二十五万人；五传而三万一千二百五十万人。中国四万万人五六传而可。”对“快”的追求，折射出志士们从文化走向政治、从天下观走向国家观的心理调适过程中，实用主义倾向日益占据上风。

三是信息流通速度加快，危机时局的促逼需要打破上下、内外的区隔，使得民众既能通国事、民情亦能达于庙堂。在产生、传递和接受信息的三个环节中，有一个互相适应的过程。当媒介自身无法承载信息流量的膨胀、流通速度以及信息要突破此前设定的边界的时候，人们自然会转向新的替代性媒介，或者对旧媒介的结构进行调整，重新恢复一种社会平衡（陈卫星，2008）。

早在切音字运动之前，伴随着条约体系而来的外国传教士的活动，他们就已经使用罗马拼音来拼写方言，并且用方言出版了大量宗教性书籍（熊月之，2011；游汝杰，2002）。在传教士看来，汉字·汉文的繁难是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这一观点在后来切音字运动的支持者那里得到了强调。将文字与国家强弱挂起钩来，本是传教士的见解，却很快由中国人主动说出并且相当认同，体现了在船坚炮利的军事侵略之下中西文化的权势开始发生转移（王东杰，2009；罗志田，1995）。“言文一致”早在黄遵宪于1887年完成的《日本国志》一书中就已经提及，但到了甲午之后才广为人知。在这不到十年的时间积蓄中，传播情境的复杂化，呼唤一个新的传播体系以适应社会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说，发现“声音语”和“文字语”的严重分离，不能排除此前传教士的罗马字实践的影响，也不能对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视而不见；但更为重要的是从“天下”到“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依然保持原有传播状态的汉字·汉文已经无法跟上传播情境的变化，需要重新划定一个新的、能够维持社会共同体有效运作的信息边界。

声音文化的“社会隐喻”

从“天下”到“国家”的转变过程中，释放了能够突破已有信息边界的“声音”。但“声音”在文字当中的展示却被限定了范围，切音字运动只是一场面向下层民众的语言运动。在这些推行者看来，汉字繁难，下层民众难以掌握，它们是士林之专有物。设定另一种文字是不得已的选择，绝对不能威胁到汉字的权威。桐乡都鸿藻（1909：38）就认为：



简字之设，所以为无量数穷民谋毛褐粗粝。毛褐粗粝，其力固不足以废文绣脍炙也。……创设简字者，必无废汉字之心。简字大行其力，亦必不足以废汉字。（《简字利弊说》，《浙江教育官报》，1909，08）

简字只是“毛褐粗粝”，汉字则是“文绣脍炙”，前者是知识阶层对下层民众的“施舍”。即便如此，“声音”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切音字运动，1900年代兴起了以演讲、戏曲、音乐等诸多形式的“言语文化”。

《警钟日报》在1904、1905年间就曾多次报道了各地兴办讲演会、戏曲改良会等情况，如登载《戏剧改良会开办简章》、《绍兴戏曲改良会简章》等专件（1904，8，7；8，8）。记有苏州“同里组织音乐会”（1904，8，16），上海“纪续演瓜种兰因新剧”（1904，8，16），吴淞“记玫瑰花新戏”（1904，9，3），埭溪蔡绿农添设讲演小说以及教授唱歌（1904，11，21；11，23；12，30），衢州的宣讲会（1904，12，11），保定设茶话所（1904，12，12），嵯邑“练习演说会之发达”“以唤起国民思想，开通下流社会”（1904，11，9）等。“祝演说之前途”则记在沙头社学演说时的盛况，还称“到处演说以开风气，其功效之大，何可限量”（1904，8，23），足可见当时“言语文化”之盛。那为何“声音”在清末突然繁荣起来，它在塑造“新民”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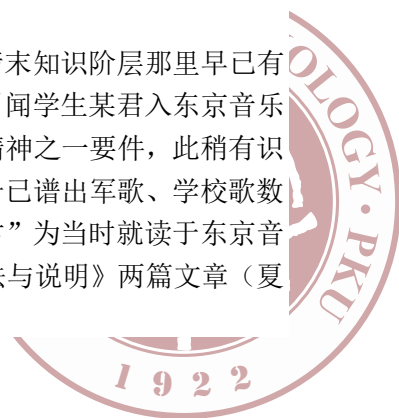
从声音的媒介特质来看，其一，受空间的物理和文化环境限制。在清末演说、宣讲、讲报一般发生在茶馆、戏院等人群较为密集的地方，或者独辟专门的场所如讲报处、宣讲所等等。在此类空间中，市井百姓占了多数。所以，空间的有限、嘈杂，文化的区隔，需要简单、浅显的话语才能便于民众理解。演说者尽量使用套语，重复的力量远胜于理性的说服。

其二，声音难以“保存”，无法脱离“当时当下”的情境，所以在演讲过程中更为注重情绪的渲染，听者现场的“情感投入”程度和演说的说服效果有很大联系。亚里士多德（2004：151）就曾指出：“当听众的情感被演说打动的时候，演说者可以利用听众的心理来产生说服的效力。”《警钟日报》记录某演说情形时提到：“到听者几及千人。座中多有泣下者。异日乡中农民复请演说，感泣如初”，后又记王君痛陈缠足之害，“听者泣不可抑。即晚放足者凡七人，其影响之捷如此。”（1904，8，23）

再有，相对于文字对个体理性的挖掘、扩展主体性、由知识的独立引发逻辑上的争论和怀疑主义不同的是，声音不会提供足够的时间让听者去“回味”。声音的“转瞬即逝”，用口号式的传诵、富有韵律的口头诗，乃至断语取代逻辑上的严密和精准，以此延续声音消失之后的效力。（保罗·康纳顿 Paul Connerton，2000；翁 Walter J. Ong，2008）清末的讲演似乎复活了口语传播时代“集体记忆”的特点。

其三，声音是一种表达和接收的“统觉”体系。演说者的在场表现，体态、声音、语调等各方面触觉、听觉、视觉的糅合，直接影响到听者的情绪。《警钟日报》就载有衢州的“江山院演会”（1904，12，11）：演说者“至此不觉万箭拟心，呜咽不能放声，时在座父老亦为之动容者。”翁（2008：51）就认为，“口语词一定会受到总体生存环境的修正，而总体生存环境总是需要身体的参与”，身体运动自然而然地和声音同时展现。

由上而知，声音媒介具有非理性和鼓动色彩，而声音的传播效果在清末知识阶层那里早已有所识见。梁启超（1996：281，282）就感叹：“声音之道感人深矣”，“闻学生某君入东京音乐学校，专研究乐学，余喜无量。盖欲改造国民之质量，则诗歌、音乐为精神之一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顷读杂志《江苏》，屡陈中国音乐改良之义，其第七号已谱出军歌、学校歌数阙，读之拍案叫绝，此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也”。梁启超在此所指“某君”为当时就读于东京音乐学校的曾志恣，他在《江苏》上发表了《乐理大意》和《唱歌之教授法与说明》两篇文章（夏晓虹，2006：96-97）。



梁启超（1996：282）指出：“自明以前，文学家多通音律，而无论雅乐、剧曲，大率皆由士大夫主持之，虽或衰靡，而俚俗犹不至于太甚。本朝以来，则音律之学，士大夫无复过问，而先王乐教，乃全委诸教坊优伎之手矣。”故中国之词章家，于国民无丝毫之影响，原因在于诗乐二分。“然乐也者，人情所不能免，人道所不能废也”，将“耳的诗”全委诸俗伶之手，“移风易俗之大权遂为市井无赖所握，故今后言社会改良者，则雅乐、俗剧两方面，其不可偏废也”（梁启超，1906：80）。

欧榘甲（1996：52，56）在《观戏记》中言：“记者又尝游日本矣，观其所演之剧，……其激发国民爱国之精神，乃如斯其速哉？胜于千万演说台多矣！胜于千万报章多矣”，“演戏之移易人志，直如镜之照物，靛之染衣，无所遁脱。论世者谓学术有左右世界之力；若演戏者，岂非左右一国之力者哉？中国不欲振兴则已，欲振兴可不于演戏加之意乎？加之意奈何？一曰改班本，二曰改乐器”。陈独秀（1993：89）在《论戏曲》中说道：“各处维新的志士设出多少开通风气的法子，像那开办学堂虽好，可惜教人甚少，见效太缓。做小说、开报馆，容易开人智慧，但是认不得字的人，还是得不着益处。我看惟有戏曲改良，多唱些暗对时事开通风气的新戏，无论高下三等人，看看都可以感动，便是聋子也看得见，瞎子也听得见，这不是开通风气第一方便的法门吗？”

“声音”威力之大，当局对之也甚为恐慌。《警钟日报》就载有一事，在河南“满人干涉演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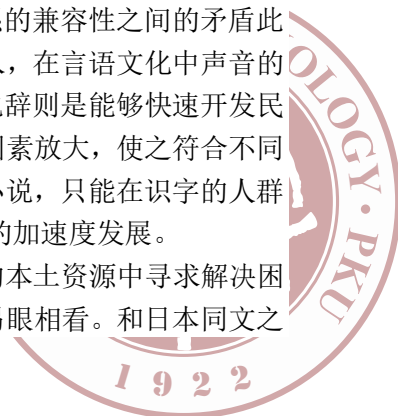
（王、张诸志士）首于八月初八日开演说会于邑之大王庙，一时旁听二百余人。闻瓜分灭种惨祸，有下泪者。于是宋寺湾、黄冶等村相继演说，颇有风动一时之概。设永续不辍三月以后，民智必为大开。不意县令满人舒泰遽以谣惑人心为词，极力干涉，诸顽旧复相和反对王张诸志士。寡众不敌，遂不得不渐行停止以图后举云。（1904，10，25）

清末具备革新意识的知识人为何不约而同地选择“声音”，显然不能忽略声音自身的特质，但声音媒介并非是“自治”的，不能自动发挥作用，或者自然导向某种结果，只有和其他社会关系的相互激发才能产生某种变化的可能性空间。所以，声音在清末受到推崇，必然要追寻这一选择背后的历史逻辑和社会心理基础。

甲午之后，求新求变已经成为社会的常态。在1902-1903年的《游学译编》中，经常出现“中国之种祸固如何巨如何急乎”，“今日国势危险极矣”之类的言辞。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急于寻求能够快速改变现状的“快捷方式”，比如二人皆提倡学日本文，认为识习日文耗时间短，“而学日本文者，数日而小成，数月而大成。日本之学，已尽为我有矣。天下之事，孰有快于此者。夫日本于最新最精之学，虽不无欠缺，然其大端固已粗具矣。中国人而得此，则其智慧固可以骤增，而人才固可以骤出”（梁启超，1989：81）。中国从“天下”到身居国际体系的边缘位置，对当时还揣有帝国想象的知识人而言无疑是一种屈辱。所以，对“快”的追求并非只是局限于少数知识人，而是成为当时社会的“集体无意识”。

“快”意味着要提升速度，缩短社会转变的时间成本，推动社会结构的加速度重组。这种对快的竭斯底里的冲动有时会无视社会系统的惰性，求快的冲动和固有体系的兼容性之间的矛盾此后成为了社会发展的“痼疾”。而在清末的语言运动中，声音维度的引入，在言语文化中声音的多方位展现，皆与求快的冲动有关。切音字运动的实施，其最有力的说辞则是能够快速开发民智，继而实现国家富强。言语文化则将声音媒介中存在的非理性、鼓动因素放大，使之符合不同社会群体的野心和意图。办学堂，教育过程太过“漫长”；办报、做新小说，只能在识字的人群中传阅。相较于汉字·汉文的笨重，声音的“轻快”能够带动社会体系的加速度发展。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无法从既有的本土资源中寻求解决困境的出路。而近邻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的表现，让清末志士们另眼相看。和日本同文之



故，借道日本学习西方知识，就能节约时间成本。而日本的成功经验，对当时知识人而言，无疑是在阴霾中透过的曙光。1896年以后的赴日留学生“到那时候为止的世界历史上，可能是最大规模的海外学生群众运动”（任达，2010：48）。清末以来的“言文一致”、“统一语言”、“国语”的发展，乃至言语文化的繁荣，也有来自日本的“模板”。

梁启超较为系统讨论乐学的文字，来源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题为“饮冰室诗话”的连载，是其戊戌变法后流亡日本期间的文章。而欧榭甲对演剧的宣扬，所参考的“成功”本则是在日本的观剧经验。陈独秀的《论戏曲》一文在1904年9月10日正式刊登于《安徽俗话报》第十一期上，而另有一篇署名亦是“三爱”的《论戏曲》则以文言文写就，发表于1905年3月的《新小说》上。陈独秀对戏曲改良的重视亦不能不考虑他于1901年、1902年两次赴日留学的经历（唐宝林，林茂生，1988：18，21）。清末部分知识人在日本游历的人生阅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他们对现实的判断和革新方案的制定。当时留日学生亦和国内舆论有所联系，《警钟日报》就积极刊登留日学生近况等新闻，曾登载题为《东京演说练习会简章》的专件（1904，9，11）。思想的跨国流动，也促进了国内知识人的启蒙实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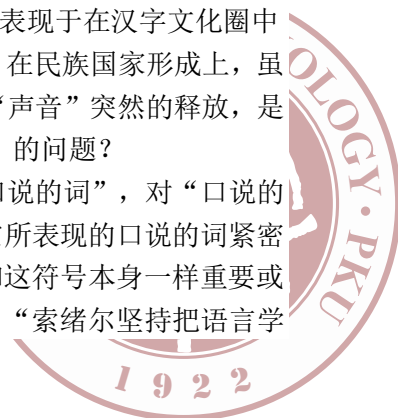
1896年以后，清廷派遣大量留学生、翻译日文书籍、引进日本新名词等等，皆是以取道日本，实现国家富强为目标。在1898年张之洞的《劝学篇》（1998：117）中论道：“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康有为（2007：264）也表达过类似观点：“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为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作为“昔日之师傅”的中华帝国，如今要向学于日本，当时士人阶层的情感是复杂的，在话语表达中暗示学习日本只是权宜之计，是摆脱困境的快捷方式，最终是要向泰西看齐。任达（2010：49）就指出：“日本是块垫脚石，是获得西方知识、导致中国富强的快捷方式，使用后便遭抛弃。这种态度对近代中日关系牵连极大，坦率地说，这是傲慢的和麻木不仁的态度，说明了并未把日本以其本身资格作为一个国家，或作为一种文化而表示兴趣或适当评价。”

所以，甲午之后对日本经验的效仿，亦只是暂时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由求快冲动导向的“模仿”。对于当时中国而言，在“天下”到“国家”的转变过程中，正在逐渐抛却、远离传统的价值观念。中国如何屹立于“万国”丛林，如何改造“老大中国”沉重的历史背负，声音媒介的适时发现由此带来某种变革的可能。而对于当时中国和日本而言，追逐“现代国家”的欲望冲动的最终来源则是西方世界。

语音中心主义与“国家观”

日本的文字改革为中国提供了“本”，中国也想模仿甚至重复日本的语言之路，却不知当时日本“废除汉字论”、“言文一致”口号的提出，是为了摆脱他者——汉字·汉文的影响，“脱亚入欧”。中国志士改革文字的落脚点却是走向富强，并非想要改变“民族性”，这是两者最大的差异。柄谷行人（2003：195）指出：“在日本，民族主义的萌芽主要表现于在汉字文化圈中把表音性的文字置于优越位置的运动中。但是，这并非日本特有的事情。在民族国家形成上，虽有时间先后的不同，然世界上无一例外地要发生这样的问题”。那清末“声音”突然的释放，是否意味着从“天下”到“国家”的转变过程中，也存在“语音中心主义”的问题？

先回到索绪尔的语言学。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只有“口说的词”，对“口说的词”的研究需要利用书写的证据，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书写的词常跟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在一起，结果篡夺了主要的作用；人们终于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索绪尔，1999：48）。柄谷行人（2003：199）认为：“索绪尔坚持把语言学



的对象限制在口语范围内，并不是因为语音中心主义，而是因为要暴露历史语言学的语音中心主义之欺骗性。”索绪尔考察的“语言”，是一种“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没有明确界线的语言”，不被书写浸染、未被规范化的复数的“方言”，但此“方言”也只是理论上的存在（柄谷行人，2003：203）。“方言”是无形的、流质的状态，一旦固定就被规范化。所以，索绪尔的语言学不适用于任何被特别限定的语言，而是“语言”就这样存在着，仅此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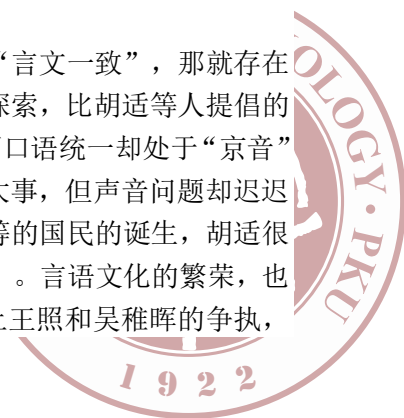
就国语来说，它早已渗入文字的影响，是以压制和放逐方言为代价。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提升了“声音”的地位，同时自我标榜“语音中心主义”，而借此毁灭此前书面语的存在价值，在这背后隐藏着其他意图。所以，常以无视政治性而遭非难的索绪尔，他“所要批判的就是将这个政治性内在化并最后消解掉的那种语言学”，“索绪尔排除书面语，不是因为声音中心主义，而是为了阐明声音中心主义暗中使书写语言=国家内在化的欺骗性”（柄谷行人，2003：199，202）。柄谷行人从日本的语言经验出发对索绪尔进行了再阐释，但他将“语音中心主义”从形而上学的限定中解放出来，放置到民族国家的建构框架中去，带有启发意义。

日本语言近代化过程中借“声音中心主义”之名排除汉字·汉文的影响，最后的实质则是汉文的书写早已经渗透到“大和语言”中，一切的抹杀只是出于政治性。因此，日本“言文一致”运动，实是借语音中心主义来消除汉字的影响，找寻属于日本的“民族性”。日本“语音中心主义”存在的合理性是同民族国家的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选择欧化，并非要驱逐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日本文中还依然留有汉字的位置），而是借此让日本的民族主义有了名义上的安顿之处。

回到晚清中国。在此以前漫长的王朝时代，汉字·汉文作为书写媒介，将不同区域整合在一起，也将各异的“方言”问题悬置起来，因为在封闭的“天下”时期，“声音”不足以扰乱既定的传播秩序。清末以后，急于改变现状的晚清志士们逐渐接受了汉字·汉文繁难的观念，也就丧失了从汉字·汉文内部进行改良的方法路径。声音被认定能够“快速”改变现实，因而是“快”媒介，汉字·汉文则是“慢”媒介，在这场“快慢”角逐中汉字·汉文日趋下风。甚至有“新世纪派”者，主张彻底废除汉字，采用“世界语”。清末“语音中心主义”的萌生是回应来自西方、日本的冲击，当然也不排除西方借“语音中心主义”贬低文字以此抹杀先进的异质文明的企图（柄谷行人，2003）。

在切音字运动中，大多数是拼方言之故，一名词有一地之发音，那各地方言又如何统一呢？再有，提倡方言，是否有分隔国家之嫌，面对这种指摘，切音字运动者又开始着重于对语言统一问题的辩解。到1900年代以后，官话音方案开始大量出现。如果要寻找索绪尔的“语言”，方言可归属于此。但1900年代对“国语”问题的争执主要集中在统一语言的问题上。1903年直隶大学堂学生王用舟、何凤华等人《上直隶总督袁世凯书》恳请颁行官话字母，设普通国语学科以开民智而救大局事，其方法之一则有：“统一语言以结团体也。吾国南北各省，口音互异，甚有隔省之人不能通姓名之弊。夫国人所赖以相通相结者，语言也。言不类则心易疑，此涣散之本也。”（何凤华等，1958：36）《东京演说练习会简章》中还专门提到“普通语”：“中国语言各处不同，故演说者虽滔滔不绝，而听者竟充耳罔闻。会中当附属一普通语研究会。”（《警钟日报》，1904，9，11）

但“国语”的提出，不只是“统一语言”，还要改造书面语，实现“言文一致”，那就存在“由言而文”，还是“由文而言”的选择（袁先欣，2010）。对声音的探索，比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文运动还早了一二十年的时间。五四白话文解决了书面语的问题，而口语统一却处于“京音”和“国音”的争议之中。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已经是一件“撼天动地”的大事，但声音问题却迟迟未能解决。试究其原因，白话文打破了文化的区隔，促成同质化的、平等的国民的诞生，胡适很早而且清楚地认识到了这场文学革命之民主的潜在意义（格里德，2005）。言语文化的繁荣，也必然会促使知识人去探讨不同方言间的沟通问题。1913年读音统一会上王照和吴稚晖的争执，



1920年代的京音和国音之争，方言区在全国范围内的轻重对比似乎并不是矛头所在。事实上，民初“国音”记的是读书音系统，是字音，是明清官话音的尾声（叶宝奎，2007）。而“京音”相对于读书音“雅音”来说，带有“土俗鄙塞”之音，所以不被吴稚晖承认。1920年代的京音、国音之争，延续了1913年南北争议的未竟之举，实是体现了两种历史逻辑的矛盾，京音派指向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如何能够在语言变革的协助下实现，国音派则强调民族主义的文化认同（袁先欣，2009）。如果说在中华帝国时期，在一定阶层内部沟通的汉字·汉文体系、官话音系统代表强大的文化本源，那么京音、五四白话文则离传统愈来愈远，甚至有切断和传统联系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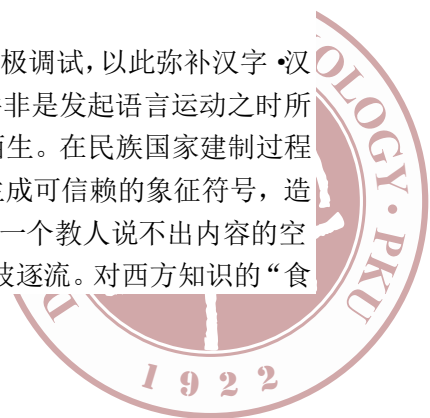
在中国的语言运动中，从言文相离到言文一致，因为声音的介入，言和文皆发生改变。与日本寻求“民族性”不同的是，中国需要去面对在模仿西方先进文明的同时，如何处理和传统的关系来建构民族的主体性，以及在“天下”到“国家”的转变过程中，新的认同体系又该如何确立。按照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 2010）的观点，自十六世纪开始，以英格兰为代表的以疆域作为契约标准的“原初民族主义”向外“拓展”以后，演变为以族裔为标准，注重语言、习俗、地域联系和体貌特征之类的“特殊的民族主义”，由此在英格兰、美国之外，族裔民族和疆土国家之间要产生新的认同基础，这就构成民族主义的复杂性。清末的“排满”运动、多民族如何统合的问题也与此有关。

所以，中国的语音中心主义的表现形式具有独特性，它存在柄谷行人认为的“书面语”对声音的渗透，“国语”的确立亦有政治权力的干预，“语音中心主义”只是某种幌子。但是和日本的自欺欺人相比，无论是在文，还是在言，声音都在积极介入改造，它无须掩盖什么秘密。选择声音，甚至废除汉字，当时知识人自觉地重构“天下”体系，调整对世界的认知，推动现代国家的建制，将此视为可能的出路。清季中国在现代世界的严重挫折，遭遇西方国家在对外侵略中所裹挟的现代性，对此既有怨恨却不得不模仿，同样对传统既有依恋却不得不放弃。余英时先生（2006）对“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报以悲观情绪，就前者而言，儒家纲常伦理遭到严重的唾弃从而引发强烈的认同危机，清末以来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依然在潜意识中留存传统的历史记忆，后者有关“公民”、“主权”之类的观念又难以被消化，两者故常常纠结在一起。从清末的语言运动开始，到五四运动时期的全盘反传统，再到文革，文化改造的“激进色彩”得到了全面的展示。

余论

那声音优先本身是否符合启蒙理性的逻辑指向？从声音媒介来看。声音的非理性、鼓动的一面在急于改变现状的社会心态之下被放大。“求快”的社会无意识让一切转变显得匆促和不成熟。从“臣民”到“国民”、“新民”的启蒙计划被不同政见之争、时局的恶化所打断。“声音”短期的规训效果，为人瞩目，但是缺少长期、理性的教化，所谓的“新民”也只是工具性的存在，离个体自由、讲求权利的“公民”还有很远的距离。如沈松桥（2011：333）认为的，“‘国民’，在这套论述形构中，纵然剿袭了诸多自由民主体制之下‘公民’所常具备的外在形貌，其实却绝无 citizenship 概念所不可或缺的政治主体性可言。”

清末声音的展示并非是偶然事件，它的释放是对新的传播情境的积极调试，以此弥补汉字·汉文在传播范围、速率上的不足。但此后声音对言和文的深刻影响，却并非是发起语言运动之时所能预计的，由此造成语言和文字的断裂，亦或者说和传统愈加疏离和陌生。在民族国家建制过程中，传统是主体性建构的基础和来源，不断抑制、攻击传统导致无法生成可信赖的象征符号，造就的是如白鲁恂（Pye Lucian, 1992）所认为的中国民族主义只剩下“一个教人说不出内容的空壳”，从而缺少明确、共同的集体理想，最终不断被外在势力胁迫而随波逐流。对西方知识的“食



新不化”，只是想快速摆脱眼前局势而寻找认为最可靠的参照系，使得一次次的政治规划还未来得及实施却已付之东流。

就声音自身而言，它依然是秩序的“对立面”，众声喧哗和异议的代表。它暂时被国语收编，但在统治意识形态尚未足够强大时，在中心和边缘的对抗中，又被重新唤醒，充当政治权力竞争的工具，并和“国语”相对抗。统一和分裂的力量不时地挑起“方言”和“国语”的纷争。在这个意义上说，声音是边缘力量施加于中心的压力，一旦中心被推翻，声音即被压制。所以，在中国语境之下，西方意义上的“语音中心主义”是不存在的。如果说它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夹杂着特定目的和指向一种政治性的存在方式，在现代性的幻觉中进行追逐游戏。它是附属的，而不是独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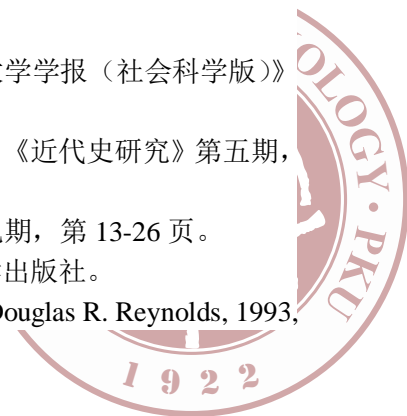
参考文献

史料部分：

- 《警钟日报》，从1904年2月26日至1905年初。
- 王用舟、何凤华等，1958，《上直隶总督袁世凯书》，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第35-40页。
- 王照，1958，“官话合声字母（原序一）”，《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第19-21页。
- 吴汝纶，1958，《东游丛录》（节录），载自《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第26-29页。
- 梁启超，1958，《沈氏音书序》，《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第7-9页。
- 梁启超，1994，《新民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 梁启超，1996，《饮冰室诗话》（选录），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下册），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第280-282页。
- 梁启超，1989，《论学日本文之益》，《饮冰室合集》第一卷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第80-82页。
- 陈独秀，1993，《论戏曲》，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86-90页。
- 都鸿藻，1909，“简字利弊说”，《浙江教育官报》第八期，第36-38页。
- 饮冰识语，1906，载渊实“中国诗乐之变迁与戏曲发展之关系”，《新民丛报》第四年第五号，第55-80页。
- 张之洞，1998，《劝学篇》。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 康有为，2007，“日本书目志（自序）”，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63-264页。
- 劳乃宣，1957，《简字谱录》。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欧榘甲，1996，《观戏记》，《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下册），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第51-56页。
- 卢懋章，1958，“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第302-334页。

论著部分：

- 王东杰，2009，“从文字变起：中西学战中的清末切音字运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第78-89页。
- 王东杰，2010，“‘声入心通’：清末切音字运动和‘国语统一’思潮的纠结”，《近代史研究》第五期，第82-106页。
- 白鲁恂，1992，“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林雅译，《二十一世纪》第九期，第13-26页。
- 弗兰索瓦·余莲，2009，《势：中国的效力观》，卓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任达，2010，《新政革命与日本》（李仲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Douglas R. Reynolds, 1993,



-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吴予敏, 2001, “帝制中国的媒介权力”, 《读书》第三期, 第 74-80 页。
- 沃尔特·翁, 2008, 《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 语词的技术化》, 何道宽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Walter J. Ong, 1982,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Routledge.)
- 李庆林, 2006, 《皇权专制的建构和叙事》。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 李孝悌, 2001, 《清末的下层启蒙运动: 1901-1911》。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 沈松桥, 2011, “国权与民权: 晚清的‘国民’论述, 1895-1911”, 许纪霖等编, 《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概念》,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 302-334 页。
- 余英时, 2006, “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 293-302 页。
- 约瑟夫·列文森, 2009, 《儒家中国与现代命运》, 郑大华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Joseph R. Levenson, 1958,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金观涛、刘青峰, 2009, 《观念史研究》。北京: 法律出版社。
- 马西尼, 1997, 《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北京: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Federico Masini, 1993,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0.6, Berkeley, USA.)
- 郜元宝, 2010, 《汉语别史——现代中国的语言体验》。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 柄谷行人, 2003, “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 载《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赵京华译, 上海: 三联书店, 第 194-212 页。
- 保罗·康纳顿, 2000, 《社会如何记忆》, 纳日碧力戈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Paul Connerton, 1989, *How Societies Rememb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哈罗德·英尼斯, 2003, 《传播的偏向》, 何道宽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Harold A. Innis, 1999,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威廉·洪堡特, 2001, 《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 姚小平译,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 袁先欣, 2009, “语音、国语与民族主义: 从五四时期的国语统一论争谈起”, 《文学评论》第 4 期, 第 136-142 页。
- 袁先欣, 2010, “国语中的‘言’与‘文’”,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6 期, 第 124-129 页。
- 格里德, 2005,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鲁奇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Jerome B. Grieder, 1970,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陈旭麓, 1992,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索绪尔, 1999, 《普通语言学教程》, 高名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夏晓虹, 2006, 《阅读梁启超》, 北京: 三联·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陈卫星, 2008, 《传播的观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唐宝林、林茂生, 1988, 《陈独秀年谱》。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麦克卢汉, 2000, 《麦克卢汉精粹》, 何道宽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Eric McLuhan & Frank Zingrone, eds., 1995, *Essential McLuhan*. Stoddart Publishing Co., Ltd.)
- 里亚·格林菲尔德, 2010, 《民族主义: 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 王春华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 (Liah Greenfeld, 1992,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雅克·德里达, 1999, 《论文字学》, 汪堂家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程美宝, 2006, 《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 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 上海: 三联书店。
- 叶宝奎, 2007, “民初国音的回顾与反思”,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5 期, 第 44-50 页。
- 游汝杰, 2002, 《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 詹姆斯·凯瑞，2005，《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James W. Carey, 1989,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in Media and Society*. Routledge.）
- 赵鼎新，2006，《东周列国与儒家国家》，夏江旗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熊月之，2011，《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罗志田，1995，“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近代史研究》第3期，第1-23页。
- 罗念生，2004，《罗念生全集：亚里士多德〈诗学〉、〈修辞学〉、佚名〈喜剧论纲〉》，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论 文】

土耳其革命史三题¹

——国际法、领袖与帝国

咎涛²

一、前言

今天，在区域和国际研究的意义上，了解和研究土耳其，尤其是它的历史，既有学术的兴趣，也应是中国与世界关系这个时代大命题的一部分（咎涛，2017-12-20）。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样的“时代命题”亦不惟今日所独有，已被多数人忘记的是，了解和研究土耳其，一度是近代以降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们颇为热衷的课题（咎涛，2017-2）。由此，我们今日所谓的关注就既是传承、又具新意。

格言云：“过去即外国”（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其意是说，当下之人看待或研究自己的历史，就像看同时代的外国一样，前者是时间的距离，后者是空间的距离。进一步言，若是研究外国的历史，当是时间和空间意义上存在双重距离，更不必说语言和文化上的隔膜。此即研读外国历史的特殊处。

著名史家汤因比曾睿智地点明：若谈论自己以外之事物，任何个人或集团都难免自我中心主义，此为人类社会之常态，也是成为人的一种“代价”（汤因比，1998:11）。从中文读者的角度说，相对而言，土耳其在时空、文化和情感上跟我们的距离是比较远的。

前述各种距离与隔膜，决定了大部分国人对土耳其的陌生感。基于此，以中文为媒介创作的各类作品，当以此“距离”为心理前提，并尽力拉近之。相应地，若以当下为引子，从现在说起，或许是一个能稍稍缩短那些距离的某种合适方法。当然，如何措置历史与现实之关系，学者们向来聚讼纷纭。此处不赘言。

二、“洛桑”之约

2017年12月7-8日，当代著名的政治领导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访问了其邻国希腊。这并不是一次平常的外交活动。自1952年以来，亦即65年中，这是土耳其

A. ¹ 本文刊载于《上海书评》，2018年1月13日。

²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